

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

陈 涛

[摘要] 海洋溢油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凸显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它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影响,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可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分别探讨了溢油事件的社会根源、社会文化影响与心理影响及其康复以及权力博弈等议题。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追踪性和深入性。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

[关键词] 海洋溢油; 社会影响; 权力博弈; 心理康复; 环境社会学

在现代社会,环境风险与技术灾害时有发生。在诸多环境危机中,海洋溢油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世人面前,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而随着世界海洋开发进程的推进,海洋溢油事件爆发的频率和影响范围亦日愈增加。美国的圣巴巴拉溢油事件(Santa Barbara oil spill,196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Exxon Valdez oil spill,1989年)和墨西哥湾溢油事件(BP Oil Spill,2010年)等重大海洋溢油事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害、经济损失、社会影响以及文化破坏,引起了国外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美国,海洋开发和海洋溢油也是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重要内容^[1],相关学者甚至开展了长达几十年的追踪研究。

近年来,中国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中,海洋石油开采及其运输规模大幅提升,而其中的技术风险和生态风险同样不容小觑。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这起溢油事件的生态损失和社会影响至今未有定论。事实上,在渤海溢油事件发生前,我国的海洋溢油事件就时有发生。而中国学术界有关溢油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法学、环境科学、管理学等学科框架内。相比之下,社会学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在主流社会学的研究中,这似乎尚未成为一个问题。与国外社会学的学术动态相比,这显得十分滞后。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随着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发达,溢油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波”常常超乎想象。对溢油事件的影响评估,已经远远超出环境科学、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视野,迫切需要社会学视角的介入,迫切需要环境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关怀。

本文试图框定美国社会学界在海洋溢油事件议题中的主要研究框架,梳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最后将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中国海洋溢油事件研究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启示。

一、海洋溢油及其影响评估

就类型学意义而言,灾害可分为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与技术灾害(technological disaster)两种。其中,自然灾害是气象、地震等自然因素引发的,包括地震、飓风、海啸等等。而技术灾害则是不负责任的、不谨慎的或者鲁莽行为等人为因素导致的。有毒物生产、运输及其密封系统的运行与管理环节中的技术系统失败常常引发技术灾害。溢油事件属于典型的技术灾害^[2]。在海洋石

[收稿日期] 2012-02-24

[基金项目]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青年项目“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AOCQN2011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 涛,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所/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讲师,社会学博士,邮编:266100。

油开采和运输等环节中,操作失误、管理不善以及触礁等多重因素都会导致石油泄漏即溢油问题。溢油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率先开展的评估一般是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而事实上,溢油事件的影响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会引发生态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等连锁反应。因而,溢油事件的精确影响评估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我们以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等案例说明之。

1989年3月24日,超级油轮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在威廉王子海湾(Prince William Sound)因为触礁发生溢油,造成了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溢油事件。溢油事件导致水面浮油达到3万平方英里,影响了1200英里的海岸线。溢油事件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是毁灭性的,而所溢出的石油也导致生物降解、物理风化的速率更加缓慢等问题。事件发生6个月后,威廉王子海湾的鸟类、海洋哺乳动物大量死亡。尼科尔斯(Nichols)的保守估计数据显示,溢油造成3.3万只鸟、980只海獭、30头麻斑海豹、17头灰鲸和14头海狮死亡。而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严重低估了其生态影响。1991年的一份环境影响报告显示,溢油事件直接导致3500~5500只海獭和35万只鸟类死亡^[3]。在溢油事件之前,在全美最有利润的十大水产品港口中,威廉王子海峽附近的科尔多瓦(Cordova)一直位居前十,而溢油事件发生21年之后,甚至还排在25名之后^[4]。科恩(Cohen)运用事后分析(expost analysis)评估了该起溢油事件对阿拉斯加中南部渔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指出在溢油事件的第一年,渔业损失的上限是1.08亿美元,第二年的损失高达4700万美元。但他同时指出,溢油事件所造成影响的综合性使得精确的损失评估很困难^[5]。2010年4月20日夜,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这就是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据估计,沉没的钻井平台每天漏油达到5.5万桶。溢油事件对墨西哥湾北部的捕捞业、休闲渔业和旅游业等造成了严重威胁。虽然初期影响比较容易确定,但有关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对生态系统、水产品安全、水和空气质量、海滩污染和旅游业等造成的长期影响,科学家、政治家、政府官员和沿岸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很多争论^[4]。

简言之,海洋溢油具有很大的生态破坏性,并会对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具有交织性和连锁性。因此,短期内对某一具体溢油事件开展精确的评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学界对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追踪性,围绕其中的政治博弈、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和心理康复等特定问题开展长期的深入研究,并对不同海域的溢油事件开展了比较研究。

二、研究框架与基本观点

美国社会学界研究了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社会过程以及社会文化后果。综观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这些研究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三大部分。所谓“根源论”,即研究溢油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所谓“影响论”,即研究溢油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影响和心理影响两个方面;所谓“博弈论”,研究的是溢油事件的社会过程,即利益相关者在溢油事件发生后的利益博弈与斗争。

(一) 溢油事件的社会根源

溢油事件的发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原因。现有的溢油事件“根源论”侧重制度层面的研究,通过“社会—政治”视角探索溢油事件的导火索。具体而言,研究的是溢油事件背后的国家石油能源政策和发展制度。

海洋石油开采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财政收入,因而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更重要的是,加大石油开发力度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和能源政策。环境社会学家弗洛伊登伯格(William R. 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 Gramling)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能源自给”政策导向等多种政治经济因素,很多海洋溢油事件就有可能得到规避^[6]。他们通过对溢油事件背后的国家石油能源

政策的研究,提供了解读溢油事件的宏观政策视角。

佛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研究发现,美国一直强调能源自给的重要性,不断推动国内的海洋石油开采。比如,1974年,尼克松总统就提出,美国须在1980年实现能源自给,而不再依赖任何其他国家。当时,美国石油消费中的36.1%来自国外,尼克松提出要通过开采国内石油终结这种依赖,而国内石油的开采主要是近海石油开采。但是,这种目标并没有实现。之后,几乎历任总统都高度强调要减少并最终结束石油依赖,实现能源自给。但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比如,截至2009年,美国的石油消耗依赖国外部分仍然高达62.2%。而这种能源依赖的压力,更加迫使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石油自给意识^{[7]5-6}。不仅如此,石油公司等利益相关者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议题中。他们积极强化石油自给的重要性,通过国家的石油能源政策和专家的论证将自己的石油开采项目合法化。可见,溢油事件爆发的背后,往往与美国的石油能源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紧密相连^[8]。

与国家高度强调石油开采相对照的是,底层民众则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比如,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以及加州海岸带,政府极力推动的海洋石油开发项目一度遭到了广泛的抗议与强烈的抵制,这种情形与海洋石油开采刚刚兴起时的情形差异甚大。1988年2月3日,联邦内政部围绕出售近海石油开采租期议题,在加州的布雷格堡举行听证会(Fort Bragg hearing)。大量的社区居民不约而同地前来,除了早到的进入听证会室内的居民外,室外还聚集了3000~5000人。他们都是示威者,强烈抗议听证会将要表决的发展项目,表达他们对近海石油开采可能引发溢油等环境危机的诸种担忧^{[9]1-5}。对这种抗议的解读是“多因论”,即多重因素引起了这样的抗议,但圣巴巴拉溢油事件则是重要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底层民众的反对促动了政府部门对石油能源政策的反思,并和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了“近海石油开采禁令”的颁布,但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美国近海石油开采的冲动。在此背景下,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似乎成了注定要发生的事情^{[7]5-6}。

(二) 溢油事件的社会文化影响

海洋溢油事件不但造成了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也威胁了受影响区域的社会运行与文化完整性。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比较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社会文化影响。阿拉斯加土著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自远古时候起就与自然和谐相处。但自从与现代西方文化接触后,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土著语言慢慢被丢弃,酗酒等行为增加,唯一没变的是“生存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这是一种小农经济,居民不会生产那些生存所需之外的物质资料。这种经济模式强调社区内的资源共享和自给自足,剩余劳动力和资源不被交换为资本,居民几乎不参与其他的经济活动,分配活动主要发生于家庭、扩大的亲属关系和村落之中,而不会存在于市场。这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根本与核心。而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爆发后,这种文化认同的核心遭遇危机^[10]。

首先,溢油事件社会影响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历史背景。溢油事件发生在早春季节,这个时间在当地的文化传统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万物复苏之际,是收获希望的时间,当地渔民正在准备捕鱼等传统活动。同时,土著人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向年轻的一代传授捕捞技术、传递共享文化价值,进而延续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溢油事件的消息传播开来的时候,阿拉斯加土著人群中表现出了包括否认、愤怒、悲伤、麻木、惶惑等在内的复杂情绪。比如,Tatitlek村的居民处于恐慌之中,因为搁浅的油轮就在几公里之外停留了数日,他们能闻到所泄露出来的石油的味道。而Cheneg Bay的土著人所忍受的痛苦更大,因为25年前的同日,一场严重的地震几乎完全摧毁了他们的村落。因而,突如其来的溢油灾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10]。可见,五味杂陈的情绪事实上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摧残,而如果不理解这种文化传统和历史,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溢油事件对土著人的深层影响。

其次,溢油事件导致传统权威的解构和社区内部问题的增加。溢油事件之前,当地从未发生过

如此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溢油事件发生后,很多传统的捕捞活动区域被封闭,水产品的安全受到广泛关注。溢油被看作是未知的化学污染物闯入阿拉斯加土著人的精神信仰和日常行为之中,恐惧和无助因而产生。后来,他们借助外界的技术和知识权威来判断水产品的安全,这导致了当地传统权威的解构。溢油事件也影响了家庭关系,当父母参加清污工作时,孩子受到的照顾和关爱明显减少了。有些父母参加清污,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缺少监管的孩子的酗酒和吸毒行为增加,一些家庭内部的家暴行为也增加了。当地没有活跃的市场活动,因而现金很少。所以,参加清污工作使一些人突然获得了很多的现金,但这并没有给社区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而是被用于吸毒和酗酒,进而增加了社区内部的社会问题^[10]。

再次,溢油事件干扰了文化传统,而清理油污活动加剧了这一危机。很多当地人参加了油污清理活动,因而没有时间参加季节性的“生存经济”活动。而由于捕捞不足,村落面临严峻的食品短缺,传统的食物共享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关系遭遇危机^[10]。社区社会网络由此遭受破坏,传统生活方式(subsistence lifestyles)遭遇困境,溢油事件由此导致了“次生灾害”(secondary disaster)^[11]。文化层面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跟踪研究表明,在多年之后,溢油事件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比如,溢油事件发生两三年后,社区居民对“生存经济”活动的参与度的减少依然较为明显,水产品捕捞量的急剧减少就是例证。究其原因,一是居民害怕水产品被石油污染进而影响健康,二是溢油事件导致海洋生物大量死亡,水产品变得更加稀缺^[10]。此外,溢油事件爆发后,企业家、政府官员、律师、科学家、清污人员等纷纷到来,而这些外来人对阿拉斯加土著人的文化和传统是“无知”的。他们通过居民的窗子拍照、谩骂老人、随意丢弃垃圾,有些人的言谈举止中甚至有种族主义倾向^[10]。所以,土著人对短时间内到来的大量陌生人及其行为方式感到不适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外来者的“闯入”导致了文化不适应和社会问题的增加。

与此同时,溢油事件的爆发和环境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倒逼”机制,促进了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比如,圣巴巴拉溢油事件至少部分地促进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颁布,而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则直接促成了《联邦油污污染法》(Federal Oil Pollution Act)的颁布^[12]。

(三) 溢油事件的心理影响及其康复

溢油事件不仅会威胁到居民的生理健康乃至生命安全,还会导致受影响居民产生心理危机和精神抑郁等问题。南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家史蒂夫·皮可(Steve Picou)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海洋溢油事件对受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康复的研究。他们对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追踪研究,对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海洋溢油对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影响及其心理康复问题。

由于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影响巨大,学术界对之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相关文献分析表明,这种研究视角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心理层面的影响属于其中的微观视角,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和工作受影响以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爆发,表现为酗酒、吸毒、家庭暴力增加,同时,受影响居民的无助感、焦虑情绪也大幅增加。而宏观层面影响包括地方政府耗竭财政储备应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应急响应、社区心理健康治疗以及相关的法律实施等,中观层面的文化影响包括社区关系紧张乃至社区冲突、社会资本破坏等^[4]。为深入研究溢油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皮可选择科尔多瓦进行了案例研究。该社区位于阿拉斯加中南部,临近威廉王子海峡,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渔业社区。社区中18%的人口是阿拉斯加土著人。其经济结构以商业捕鱼为主,是一个资源型社区,并有着渊源的食渔和商业渔业文化传统。鱼和麋鹿等资源共享是当地社会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因为河流、海域和山脉相隔,科尔多瓦与其他社区被隔开。也正因为如此,溢油没有蔓延到科尔多瓦海岸。尽管如此,溢油仍然直接影响了威廉王子海峡的渔业基础,导致渔民捕捞海产品的数量急剧减少。因此,它仍然是受影响区域,而这种影响不仅是经济和环境的影响,还包括社会与心

理层面的影响。调查发现 68% 的受访人认为工作受到了破坏性的影响,超过 50% 的人认为他们的个人计划因此改变,96% 的受访者认为社区在溢油事件 5 个月 after 发生了改变。溢油事件导致社区居民中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恐惧和愤怒的情绪,社区中出现了逃避性行为(avoidance behavior)。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开展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包括社区居民的社会性瓦解(social disruption)和心理上的紧张(psychological stress)^[3]。皮可和吉尔(Gill)在阿拉斯加三个渔业社区开展的分层随机样本调查表明,溢油事件会对资源型社区居民产生长期的心理压力。因此,当溢油这种技术灾害发生后,需要对资源型社区开展心理压力的识别和评估^[13]。正因为影响具有后发性和持续性,所以,当媒体有关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报道进入销声匿迹阶段时,真正的环境破坏和心理影响则刚刚开始^[14]。

吉尔、皮可和里奇(Ritchie)对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和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开展了对比研究。他们认为,1989 年的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和 2010 年英国石油公司(BP)发生在墨西哥湾的溢油事件是北美历史上最严重的海上溢油事件。事件 5 个月之后,他们分别对阿拉斯加的科尔多瓦和阿拉巴马的南莫比尔县(South Mobile County)的住户进行了随机样本调查。数据分析表明,两起溢油事件造成的初期心理压力和影响高度相似。最主要的心理压力影响指标是家庭的健康关心、对可再生资源利益受影响的关注、对经济损失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关注以及溢油危险的关心^[4]。墨西哥湾溢油事件造成人员死亡,对幸存者的心理康复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在受影响区域,已经爆发了自杀事件、显而易见的社区冲突以及对心理康复需求的增加等社会问题。一份研究表明,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后,父母报告孩子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比例达到 19%,而对于那些年收入低于 2.5 万美元和那些声称他们将离开目前居住社区的家庭而言,这一比例更高。盖勒普民意测验表面,墨西哥沿岸县域居民的“整体情绪健康”水平下降。而南路易斯安那居民的电话调查表明,溢油事件发生后,受访者“压力的自我评估水平”增加了一倍^[4]。对小型渔业社区和土著阿拉斯加村落而言,瓦尔迪兹溢油事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更具破坏性。事件 6 个月 after 相比较受影响区域外的社区而言,阿拉斯加土著人仍有较高程度的沮丧等心理特征。大量的案例研究和社区调查都表明,溢油事件产生了社会破坏和心理压力。相比较自然灾害而言,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更容易导致不确定性、愤怒和孤立感等社会情绪^[15]。

在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中,对抗性诉讼(adversarial litigation)本来是一种维权手段。但在与律师打交道以及理解复杂的诉讼议题方面,作为溢油事件诉讼当事人的土著居民,其受害程度加深了。研究发现,诉讼中产生了新的结构性特征,即在受影响社区中诉讼者的心理紧张程度和压力更大,从未加重了慢性的社会与心理影响^[2]。皮可还研究了实施减压策略(mitigation strategy)和干预策略(intervention strategy)以缓解溢油事件的慢性影响(chronic impact)。研究发现,通过参与式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干预式治疗的实施,能促进受害者的社会角色由“灾难受害者”向“积极的参与者”转变,进而促进社区恢复与重建。比如,通过社区教育和“共同成长”等项目的实施,起到了改善社会关系和减轻心理压力等多重目标^[16]。但是,心理康复并不容易,而且往往涉及多重因素。

(四) 溢油事件中的权力博弈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和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的玛丽琳·莱斯特(Marilyn Lester)通过对圣巴巴拉海湾(Santa Barbara Channel)溢油事件的考察,对溢油事件中的权利体系及其运作逻辑进行了专题讨论。莫罗奇认为,圣巴巴拉溢油“事故”和其他事故一样,都展示了社会结构方面的某些共同因素。就该起溢油事件而言,它揭示了美国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谁拥有它以及更为重要的,它是如何运用现存的社会组织功能消除异议的^[17]。简言之,溢油事件中的权利安排和运作逻辑是其研究的焦点。

圣巴巴拉溢油事件发生后,整个城市的海岸线都铺满了原油,数百英尺内的空气遭到恶化,作为当地传统经济基础的旅游业遭受严重威胁。虽然石油公司为其租赁权支付了 6.03 亿美金,但无

论是石油公司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对这种租赁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任何重要的法律责任。他认为,如果这样的溢油事件发生在其他地方,可能产生不了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发生在圣巴巴拉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这里有7万居民,其中大多数是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这些人是因为圣巴巴拉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才选择到此居住的。他们经济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广泛的资源,能与全国和全球的精英发生联系。同时,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从而使得这起海洋污染事件迅速传播开来。在一位前州参议员和当地公司行政主管的领导下,一个名为“清除石油”的社区组织得以成立,他们站在激进的立场上,反对圣巴巴拉海湾的任何石油开采活动^[17]。尽管如此,当科学遭遇价值中立危机时,即使是精英的环境抗争也会处于不利地位。莫罗奇研究发现,随着政府和石油公司以及地质学家的共谋(collusion)局面的出现,当地居民的维权活动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需要自己去证明持续的石油开发存在危险,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专家”认为没有什么风险。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所代表的17名原告,试图在听证会开始之前,临时禁止持续的石油开采活动。但是,联邦法官所依据的是“专家”的意见判决,因此,这种“禁止”没有得到授权^[17]。综观全球环境污染事件,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格局广泛地存在着。没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普通居民在环境抗争和维权活动中,常常因为缺少权威证据,而难以胜诉。这种逻辑在中国的环境抗争中更是普遍存在。莫罗奇和莱斯特认为,圣巴巴拉溢油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权力格局,与美国日常运转中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非常类似^[18],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权力体系的运作逻辑。

大众传媒对溢油事件的建构过程也体现了权力运作的逻辑准则。溢油事件是一突发事件,媒体的宣传报道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和处理进程会产生深刻影响。莫罗奇和莱斯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文章中对圣巴巴拉溢油事件中新闻报道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认为,相比较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和地方官员而言,联邦官员和商业发言人更容易接触媒体,掌握话语霸权。在利益博弈中,当地居民和环保组织一致反对石油公司,而石油公司试图与内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结成利益同盟继续开展海底石油钻探。在此背景下,各利益相关主体都努力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媒体报道事项,主要包括以下议题:溢油面积、溢油事件的短期和长期生态破坏、持续的石油开采会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产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石油平台对大洋岛屿审美的破坏、将来溢油的可能性、石油公司提供的经济赔偿与补助、石油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社会和商业联系、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不切实际性”和“理想主义”等等^[19]。虽然利益相关者都在通过媒体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报道言论,但因为权力格局的失衡,不同的利益主体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威德纳(Widener)和甘特(Gunter)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效地通过主流媒体诉诸意见和表达权益,主流媒体更倾向于代表中央政府、石油公司的利益,弱势群体的声音往往被忽视。而受影响区域的地方媒体和主流媒体在溢油事件的观点呈现方面具有很大不同,它更能代表受影响人群的意志。鉴于媒体在对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赋权和权益表达中的重要功能,他们建议主流媒体应该开阔视野,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而弱势群体也需要相应的策略和主流媒体沟通,否则就失去了表达权益和维护利益的机会^[20]。事实也证明,如果缺少诉诸媒体的渠道,弱势群体的声音更容易被淹没。

溢油事件中的权利运作逻辑是环境污染事件中的权力准则的一个缩影。笔者认为,这种权力运作逻辑可以这样概括:当环境事件发生后,一方面,石油公司以他们能提供税收和就业机会等向地方政府施压(有些地方甚至主动倾向于代表企业的利益,与污染企业处于利益共谋关系格局中),应对地方性的环境抗争;另一方面,当专家学者和企业共谋时,科学和技术发生价值转向,并通过其话语权优势对地方性的环境抗争产生了解构性的作用。由此,在溢油等环境事件发生后,环境风险的识别与认知以及环境事件的解决必然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

三、结论与讨论

海洋溢油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溢油事件发生后,因为种种复杂条件的限制,最初的封堵溢油口的努力往往很难成功,而这则彰显了技术主义的失灵。美国社会学家也常常以技术灾害形容海洋溢油事件。在危机处理中,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在环境监管和应急处置方面的滞后性加剧了社会信任的瓦解,使居民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心态增加,进而凸显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

美国社会学界围绕海洋溢油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探讨了溢油事件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影响以及其间的利益博弈和环境抗争。本文初步分析了美国社会学围绕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框架,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海洋溢油事件研究迫切需要社会学的介入,中国社会学界在这一议题中的话语缺失现象亟待改变。随着中国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这需要社会学界增强学术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相应的学术调查和理论分析。

其次,海洋溢油事件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影响,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研究。这给社会学围绕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提供了平台,但由于溢油事件的影响往往具有综合性和连锁性,因而也给社会影响评价研究带来了现实挑战。所以,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亟待开展。

再次,海洋溢油事件研究需要具有追踪性。美国环境社会学围绕溢油事件中的不同具体问题,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学术研究团队。有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对诸如埃克森·瓦尔迪兹溢油事件开展了二十多年的追踪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不但十分深入,而且所提炼出来的学术观点更具解释力。

最后,我们需要开展跨区域/国度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对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与美国案例的比较研究,探讨其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比如,通过对诸如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特别是其处理进程的研究,可为我国制定海洋溢油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陈涛. 美国环境社会学最新研究进展.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39-47
- [2] Picou J S. When the Solution Becomes the Problem: The Impacts of Adversarial Litigation on Survivors of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Law Journal*, 2009, 7(1): 68-88
- [3] Picou J S, Gill D A, et al. Disruption and stress in an Alaskan fishing: initial and continuing impacts of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Industrial Crisis Quarterly*, 1992, 6(3): 235-257
- [4] Gill D A, Picou J S, Ritchie L A. The Exxon Valdez and BP Oil Spills: A Comparison of Initi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2, 56(1): 3-23.
- [5] Cohen M J.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and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An Evaluation of the ExxonValdez Oil Spill. *Land Economics*, 1995, 71(1): 65-82
- [6] Gramling R, Freudenburg W R.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in the Context of U. S. Petroleum Energy Politic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992, 6(3): 175-196
- [7] Freudenburg W R, Gramling R. *Blowout in the Gulf: The BP Oil Spill Disaster and the Future of Energy in America*.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 [8] Tierney K J.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Risk. *Sociological Forum*, 1999, 14(2): 215-242
- [9] Freudenburg W R, Gramling R. *Oil in Troubled Water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over Offshore Drill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10] Gill D A , Picou J S. “The Day the Water Died: Cultural Impacts of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 in JS Picou , DA Gill & M. J. Cohen (eds) . *The Exxon Valdez Disaster: Readings on a Modern Social Problem*. Dubuque , IA: Kendall-Hunt , Publishers , 1997: 167 – 187
- [11] Dyer C L. Tradition loss as secondary disaster: Long-term cultural impacts of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Sociological Spectrum* , 1993 , 13(1) : 65 – 88
- [12] Gramling R , Freudenburg W A. Opportunity-Threat , Development , and Adaptation: Towar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ural Sociology* , 1992 , 57(2) : 216 – 234
- [13] Picou J S , Gill D A , et al.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and Chronic Psychological Stress.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 Symposium* , 1996 , 18: 879 – 893
- [14] Ritchie L A , Gill D A , Picou J S. The BP Disaster as an Exxon Valdez Rerun. *Contexts* , 2011 , 10(3) : 30 – 35
- [15] Picou J S. The “Talking Circle” as Sociological Practic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hronic Disaster Impacts. *Sociological Practice: A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Applied Sociology* , 2000 , 2(2) : 77 – 97
- [16] Picou J S. Disaster recovery as translational applied sociology: Transforming chronic community distress. *Humboldt Journal of Social Relations* , 2009 , 32(1) : 123 – 157
- [17] Molotch H. Oil in Santa Barbara and power in America. *Sociological Inquiry* , 1970 , 40: 131 – 144
- [18] Molotch A , Lester M.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 Accidents ,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74 , 39(1) : 101 – 112
- [19] Molotch A , Lester M.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75 , 81(2) : 235 – 260
- [20] Widener P , Gunter V J. Oil Spill Recovery in the Media: Missing an Alaska Native Perspective.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 2007 , 20(9) : 767 – 783

Sociological Study on American Oil Spill Event

Chen Tao

Abstract Oil spill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 and has highlighte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risk society. It has not only produced serious impacts o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 but caused profound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Research in sociological circle can be divided into “root theory” , “impact theory” and “game theory” , which focused on social root , socio-cultural impacts , psychological impact and recovery as well as authority gambling respectively. Along with the quickening of the ocean development , oil spill event in China has already been common occurrence , having profound influence to social functioning. Therefore , the Chinese sociological circle needs to increase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 and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discourse lack in the oil spill research.

Key words Oil spill; Social impact; Power gam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责任编辑: 常 英)